

# 国民经济学基础

〔德〕瓦尔特·欧肯 著

左大培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95年·北京

*Walter Eucken*

**DIE GRUNDLAGEN DER  
NATIONALÖKONOMIE**

Springer-Verlag Berlin 1989

本书根据施普林格出版社1989年版译出

GUÓMÍN JINGJIXUÉ JICHŪ

**国民经济学基础**

〔德〕瓦尔特·欧肯 著

左大培 译

---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1781-5/F·203

---

1995年1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5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270 千

印数 3 500 册

印张 111/4

(60克纸本) 定价: 12.60元

## 中译本前言

左大培

瓦尔特·欧肯的《国民经济学基础》问世于 1940 年的德国，出版后立即在德国经济学界引起轰动，4 年之中连续出了 4 版。连当时著名的德国经济学家都说，此书使他对经济学的明白程度跃上了一个新的高度。此书作用如此之大，是因为它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作了清楚而又透彻的说明，对德国历史学派与现代的理论经济学之间的争论作出了公允的结论，对经济学中理论与历史的关系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说明。对于正统的西方微观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方法、逻辑思路，此书作了精确的概括。直至今日，西方的新古典经济学仍然没有突破本书所论述的研究方法的框架。

瓦尔特·欧肯是 40 年代德国经济学中的“弗赖堡学派”的领袖。该学派为战后西德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为艾哈德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理论依据。欧肯早年曾按历史学派的方式从事过经济研究，后来又在边际主义的货币理论和资本理论研究上颇有建树。但是他最主要的著作是《国民经济学基础》和《经济政策原理》。前者论述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和研究方法，后者阐述经济政策的基本原理。时至今日，这两本书在德国仍然是经济学中的权威之作。

本书中译本据原著 1943 年版译出。中译本附上本书英译本的

一篇《绪论》和一篇《序言》。因为这两篇文章扼要地说明了著者写作本书的目的、历史背景、所针对的主要问题，以及本书在经济学中的历史地位。英译本《绪论》的作者卢茨是欧肯的学生，他在50—60年代是国际著名的资本理论权威。有了这两篇英译本前言，中译本就没有必要再作序了。

# 目 录

英译本绪论(弗·阿·卢茨撰).....	1
英译本序言(瓦尔德·欧肯).....	4
德文第一版序言.....	7
德文第二版序言摘录.....	7
德文第三版序言摘录.....	10
第一篇 一个主要问题.....	13
第一章 国民经济学的一个问题从日常经验中 产生.....	13
I. 事实与问题.....	13
II. 日常经验.....	24
第二章 问题的内在矛盾性：重大的二律背反.....	30
I. 作为个别的历史问题的问题.....	30
II. 作为一般的理论问题的问题.....	33
III. 重大的二律背反.....	37
第二篇 国民经济学批判。第二个主要问题.....	41
第一章 导论.....	41
第二章 经济阶段与经济风格.....	57
I. 做法.....	57
II. 该做法批判——第二个主要问题.....	62
第三篇 科学地认识经济实际.....	95
第一章 事实.....	96

I. 当前的事实 .....	96
II. 过去的事实 .....	99
第二章 各种经济体制 .....	106
I. 集中领导的经济——它的两种形式 .....	107
II. 交换经济 .....	117
III. 任务 .....	163
第三章 分析各种经济体制——各种资料 .....	167
I. 论对完全集中领导的经济的分析 .....	168
II. 展望对交换经济的经济体制的分析 .....	185
III. 各种经济体制的关系 .....	196
IV. 各种资料 .....	203
第四章 实际的经济。经济秩序与经济过程。 ——运用 .....	211
I. 认识各个经济秩序 .....	212
II. 认识经济过程。——理论的运用 .....	222
III. 一个简单的案例 .....	231
IV. 经济发展 .....	232
V. 经济权力 .....	253
第五章 进行经济活动的人 .....	264
第六章 结束语 .....	286
注释 .....	311
人名译名对照表 .....	350

## 英译本绪论

本书的德文第一版出版于1940年。从那时以来，这本书已经又出了五版，并被译成了西班牙文和意大利文。目前的这个英文译本依据的是德文第六版。

作者是德国弗赖堡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欧肯教授在大学学习的时候，历史学派正统治着德国大学中的经济学教学。虽然他在开始从事专业的时候沿着历史学派的道路作过一些工作，但是，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们在经济领域中从事历史研究的目的和方法都不能令他满意。这个学派的成员不能说明诸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的通货膨胀这样的经济事件的原因，这是他转向经济理论的又一个理由。他变成了历史学派在德国经济学家中最主要的敌手，在一些出版物中批评了这个学派。通过写作和教学，他为复活对经济理论的兴趣作出了贡献；在20年代，这种对经济理论的兴趣的复活是引人注目的。他又是在德国还剩下的少数几个这样的经济学家之一：他们在30年代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帮助保持了这种对经济理论的兴趣。在这个期间，他出版了《资本理论研究》（1936年\*）和面前的这本书，该书在德国的经济学杂志上立即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作为本书的补充材料，应该提到欧肯教授的一些文章，特别是《克服历史主义》（发表于《施穆勒年鉴》，1938年）和《施穆勒式的科学》（《世界经济回顾》，1940年）。

---

\* 应为1934年之误。——中译者

无疑地，本书在德语国家中所获得的成功部分地来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它填补了文献上的一个空白；这些国家比其它国家更缺少这种文献。这本书的中心论题是：经济问题的两个方面导致了通过两种途径来探讨它们：一种途径是历史的，另一种是理论的。这当然是一个老论题了。19世纪下半叶广泛地讨论过它；在那场论争中，一方面的首领是施穆勒，另一方面的是门格尔。两个人中的每一方都有其有力的论据。历史学家们可以正确地宣称：在任何一定的时期中，一国的经济发展都是总的历史发展的一部分，从而都只能在关于那个时代的政治、社会和智力的历史知识的背景之下来理解，因此必须用以历史研究为标志的各种方法来处理。他们的敌手们则可以有同样的权利宣称，这些方法并不使我们能够解释一个经济系统内部的各种相互关系，即并不能让我们追溯到观察到的各种经济事实在经济上的原因。这个论争从来也没有得到满意的解决。门格尔不能说服历史学派的追随者们；施穆勒也不能说服理论学派的追随者们；在争论停止以后，经济学的研究仍然像过去一样，沿着两条完全不同的路线进行着。

德国和世界过去20年中的各种事件必定引起对这个问题的新的讨论和探索。它们似乎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说明没有什么能够比桑巴特的下列论断离真理更远：政治事件并不决定性地影响经济发展。各种政治革命对于经济的影响变得如此明显，以至于德国年轻一代中的许多人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抽象的经济理论几乎不能对理解经济实际作出什么贡献。追溯一个既定时期中一国的经济发展，一直到标志着这个时期的各种巨大的历史（社会、政治和智力）力量，似乎是更为现实的。在德国，经济理论从未像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中那样牢固地确立起来，它似乎又注定要采取守势了。

作者接受了这个形势所提出的挑战。为了充分认识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的经济实际,到底需要什么?这是本书试图回答的主要问题。当时,许多理论家似乎与其把理论当作最终目的在于帮助说明经济实际的工具,还不如说把它当作逻辑上的练习;而许多历史学家则把经济理论当作他们车间里的一种不必要的工具。在这样一个时代中,这样一本书理应受到欢迎:它从观察有目的地取自日常经济生活的各种简单的经济事实出发,从其中阐发出一般的概念工具;再回到各种事实上来,指出怎样运用这个工具以理解经济实际,该工具对这种理解又如何必不可少;在这个过程中,就回答了经济史学家和经济理论家各起什么样的作用这样一个问题。

这本书虽然探讨方法论问题,但是读者将会发现,它与标准的方法论论文极不相同。找不到对这样一些问题的抽象讨论:例如经济学中的“归纳法”和“演绎法”,或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以及诸如此类的通常在方法论的文献中被详尽地讨论的课题。对经济实际的强烈感受;广泛的经济史知识;确信不能靠抽象地论证方法论来找到经济学中的适当做法,而是各种经济问题本身的性质决定了这种做法;作者对他的问题和结论的探讨,都是这本书独有的特征。

弗·阿·卢茨

## 英译本序言

过去一百多年中，经济学家们作出了无数不同的努力，以便更好地认识经济世界。古典经济学家们建立了一个逻辑上异常一致的体系，阐发了为经济分析所必不可少的各种方法。但是他们不能完全理解现代的经济世界——这个产业主义的、有着各种新型社会问题、循环波动以及现代的经济权力斗争的世界。当代的各种问题变得越有压力，经济科学与现实世界之间的鸿沟就变得越令人不能容忍。

19世纪经济学中的两个最重大的发展，都来自更好地认识实际经济世界的努力：这就是历史学派和现代的经济理论体系。门格尔、瓦尔拉斯、杰文斯和其他大师们规划并开始建立了经济理论的现代结构，他们的目的一直是：通过重新思考经济生活的各种基本条件而更好地把握经济实际。历史学派的道路则完全不同。他们排斥理论，致力于广泛地描述特殊的工业部门、不同国家的社会条件、农业和其它许多东西。这些都被视为一个历史发展过程的一部分并被塞进了经济发展的各种“阶段”和“风格”之中。不管这两个运动在方法上和结果上有什么不同，他们都怀着同样的冲动：渴望更好地认识现实的经济世界。正如弗里德利希·冯·维塞尔1891年所指出的：“二者都追随着时代的精神，排斥玄学的理论，在观察的王国中寻求它们的结论。”

各种经济发展和经济波动的理论都有着同样的目标。在认识经济发展的进程时，它们的目的在于更加接近经济实际，在分析与

现实世界之间的鸿沟上架起桥梁。充分就业理论也在试图向经济科学中引进更多的现实主义。在这方面它走得很远。提出它的人们相信，经济分析应该放弃各种比例、相对价格和各种物品的边际量；他们使用消费、生产、投资和储蓄的总量的术语来进行分析。在这方面，他们走的是重商主义者们的道路。我们在这里不想进行批判，我们只是要强调：充分就业理论的目的也在于更好地认识现实的经济世界。

这本书产生于同样的原因。集中的计划、各种充分就业政策、新形式的经济危机和异常迅速地变化着的日常经济生活中的各种事实，都在强迫经济学家们再一次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怎样才能把握现实的经济世界。现代的经济世界使经济学家们不断地面临着各种新的要求，而我们在这里试图回答的正是这些要求。

我们的结论是：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必须、也能够扩大，以便包括对经济现象的形态学的研究(morphological study)。对经济史的这种形态学的研究揭示了有限数量的纯粹的形式，所有过去和现在的实际的经济秩序都是由这些纯粹的形式构成的。我们的两个任务是：提炼出这些纯粹的形式；同时为将会解释经济运行过程的理论分析提供一个基础。尽管经济发展带来了种种变化，仍然可以观察到形式的一定的恒定性。我们应该不再集中注意力于试图在我们的科学理论中跟上日复一日的、迅速的经济的发展。这种尝试只是令人想起坦塔罗斯：当他伸手去摘果实时，果实总是移得离他越来越远，使他总是落在果实后面而够不到它。我们的目的毋宁是：建立一个形态学的和理论的体系，它能够包括一切经济生活，不管经济生活如何发展；它能够像一张网一样捕捉住不断变化的经济实际的形态。有了这个形态学体系，也就有可能为我们现代的各种问题而充分利用过去的理论成就。

经济学在盎格鲁—撒克逊各国的发展与在德国极不相同。19

世纪 70 年代的英国政治经济学没有受到历史学派像在德国所具有的那样深远的影响,从古典经济理论到现代经济理论的过渡不是通过“革命”,而是在马歇尔的无可争议的领导下逐渐进行的。于是,连续性就成了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的经济学的特征。但是最近就完全不同了。发生了突然的危机。作为凯恩斯的理论的出发点的各种问题、它用来工作的方法和范畴,都与那些过去占统治地位的东西不同。许多过去似乎牢靠的东西现在都成问题了;这个危机已经波及到所有国家的经济思想当中。

在这样不确定的时代中,回到经济世界的各种基本事实上去,把一切意识形态都坚定地抛到一边,似乎是有价值的。英国和美国的读者过去可能不会像在现在的形势下那样能理解本书的目的。当我们洞察了经济生活的各种实际条件时就会十分清楚;精确把握现实经济世界要求认识经济活动在其中发生的那各种不同的形式;因此,形态学的分析必须先于理论的分析。所以我相信,恰恰是本书中的各种形态学的观点可能会使英国和美国的读者们感兴趣,特别是从经济政策的各种原理的观点来看更是如此。

梯·维·哈金森先生以如此之大的谅解承担了本书的翻译工作,我理应特别愉快地感谢他。

瓦尔特·欧肯  
于布拉艾斯高的弗赖堡  
1950 年 3 月

## 德文第一版序言

本书不是一本关于方法论的著作，它的对象是经济实际。对每一门科学来说，方法论反思的滋长繁盛都是一种患病的象征。但是，单靠方法论还从来没有治愈过一门患病的科学。

向国民经济学提出的那些问题具有生命攸关的性质。这种性质肯定是与内在的不确定性、远离生活和分裂相对立的。尽管个别人取得了许多伟大的成就，这些东西仍然在很大程度上统治着国民经济学。因此，有必要重新回想起它必须解决的实质性问题。深入到经济实际当中去，科学地把握它，就是这本书的任务。

1939年11月

## 德文第二版序言摘录

本书第一版问世后，随即展开了一场科学讨论。在这场讨论中，可以一再看到对本书的主要思想的很好的理解；讨论也从不同方面促进了对所提出的问题的探讨。但是，我在讨论的过程中得出了这样的印象：应该在第二版中比在第一版中更明确地强调某些重要的思想……

思考的进程表明：科学工作有必要从各种学说观点转向实际的事物，从书本转向现实的经济，从书桌转向厂家和家计。这里所说的意思已被大多数人，但不是所有的人正确地理解了。有些人认为，这种观点反映出连科学—国民经济学的传统的那些伟大的成就都予以低估和抛弃。我已经在一次较大范围的科学座谈的过程中更详细地说明过一次我的实际态度。我想在这里重复一下这些话。

“我们必须撇开书本，去观察现实；我们必须离开权威们，去面对事实。这不是说，我们应该回到对科学一无所知的石器时代人的状态。我们当然必须知道并运用前人留下的科学知识。但是，有必要坚定地重新转向现实。也许我可以有别的一些科学来向您说明，问题在什么地方；这也有被误解的危险。

“伽利略是个既很了解古代科学、也很了解中世纪科学的人。他特别钦佩阿基米德。他充分了解这些旧的成就，但是他说：我们暂时撇开这些不谈；我们要径直研究石头的降落，或者研究为什么有落潮和涨潮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从日常的各种观察出发，从简单的事实出发；离开书本。这并不意味着鄙视过去的科学；伽利略已经充分吸取了它，它也影响了他对问题的提法。相反地，这意味着果断地转向各种事实，重新彻底研究这些事实，而不是继续纠缠于至今所有的各种观念。如果您读一下开普勒与伽利略之间令人钦佩的往来书信的话，那么您就会发现，一再重复的主要动机是：如果我们继承旧的科学，例如亚里士多德的科学，那我们就会停止不前。因此，转向事实吧！——请不要把我误解为：我想把我们当中的某个人与像伽利略那样的伟人相比。我根本不会那样作。问题不在于人物，而仅仅在于阐明这门科学的形势与我们所具有的任务。我们要确定我们所处的地点，说明我们着手研究事物时必须使用的方式。”……

“科学总是同时是两个东西：它既是革命的，又是传统的。就它彻底地提出问题并且必须这样提问题来说，它是革命的；它是传统的，是因为它不允许抛弃那些说过很重要的东西的人们所提出、所解决的问题。在经济科学现在的状况下，鉴于它面对重大的二律背反而破产的事实，我们必须特别彻底地提出问题，重新分析各种事实状况，而不能简单地继续已有的东西。这并不是不虔诚。这是在这门科学今日所处的形势下必须提出的要求。我很遗憾，我努力采取的态度被误解了。它被同那样一些人物的态度混淆在一起：他们既不了解事实，也不了解过去的科学成就，而是虚构空浮词句的体系。他们陷入了旧的、灾难性的概念的玄思当中，还认为这是彻头彻尾的新东西。我们必须最坚决地远离开这些东西。”

我们正是在讨论具体的实际问题时得知，哪些旧的问题提法、处理方法和对问题的解答是有价值的、不可缺少的，哪些推动着我们，哪些是无用的、没有价值的，必须放弃。为此本书举了许多例子。因此，当我们说：我们越是彻底地探究事实并且暂时放弃简单地继承现有的学说观点，最后就越能与精神传统中真正伟大的和富有成果的东西密切地联系起来，越能有把握地剔除多余的和有害的东西；那么，这仅仅在表面上是怪论。我们这样作（而且将会表明，我们必须这样作），不是要建立一个新的流派或一个新的宗派，而是要为这一门科学服务。

1941年9月

## 德文第三版序言摘录

关于对国民经济学传统的态度，我已经在第二版序言中发表了一些意见。有理由通过序言再谈一下这个问题。

任何开始研究国民经济学问题的人都不容易在国民经济学中找到头绪。他面对着极为多种多样的不同学说。他读比如说斯密、李斯特、桑巴特、凯恩斯以及其他老的和新的人物的著作并断定，他们说得极不相同。加之他又到处碰到利益相关的人和门外汉们的作品，起初他并不能把它们与科学的成就区分开来。他不能认出重要的东西；他把表述上的区别当成实质上的对立，不能把宝贵的东西同没有价值的东西分别开来。阅读的结果通常是把粗浅地学到的不同学说的看法并列地记在脑袋里，这种并列与实际的经济几乎没有什么联系。就是国民经济学的专家满足于折衷主义地汇集各种学说观点的事也并不罕见。此外还有这样一些作家，他们否定过去的一切或几乎一切成就，相信只有自己才拥有哲人之石。——无论如何，不存在与传统的可靠关系，不能使过去作出的伟大的思维工作对解决经济现实的问题产生多少成果，甚至不能使它产生任何成果。

如何才能在这方面造成转变？怎样才能普遍地而不仅是零星地形成一种与伟大成就的活生生的关系？——本书的回答是，不是通过简单的继承一个或另一个流派，就是说，不是靠求助于一个权威或许多权威，而是通过坚决地面对事实，面对实际的经济本身。这似乎是一个荒唐的回答。怎么？我们应该通过避开国民经济



学的伟人们来与他们建立联系？那我们岂不就背弃了他们吗？那样我们不就给自己堵住了通向他们的道路吗？——不，恰恰相反。人们是在对对象、对各种实际经济问题本身的工作中询问过去的思想家，并且在共同努力解决实际问题时真正熟悉他们的。这样人们就理解了他们所研究的各种问题、他们发展的各种方法和他们的解答的影响。这时人们就不难认识到，真正科学的、国民经济学的研究与思想家们假哲学的空话、与虚浮的方法论、与利益相关者们的看法之间隔着多大的距离。这样也就会成功地把表述上的差别与科学见解上的对立区别开来，并看到：例如现代的国民经济学理论就比局外人所经常揣测的要统一得多。鉴于国民经济学当前的状况，必须像在一门专门科学的范围内才能作到的那样彻底地提出问题。但是，恰恰是由于我们从传统转向事实，也就开始直接地、更深刻地真正理解精神传统：因为对事物的分析导致克服前人留下的历史的和理论的国民经济学的并列，把这两股精神劳动的潮流汇合到一起，由此提高了它们的效力。

最近，人们把我对国民经济学的态度与施本格勒的态度作了比较。据说，正像施本格勒认为至今为止的国民经济学在其真理与事实相遇的所有地方都已经失效了一样，我也要抛弃至今为止的国民经济学知识，因为它们不符合经济实际。据说施本格勒和我两个人都根本否定现有的国民经济学。——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误解，而且还是一种容易避免的误解！我再重复一遍：这本书是一个统一体。谁如果只读了零星的几页，那他就根本不可能理解这从属于一个总的内在关联的几页。谁要是选出那个批判篇，它离开各种学说观点而转向各个事实，以及谁要是不熟悉那些部分，它们分析事实并在工作本身中与国民经济学的大师们联系起来，谁就不会理解这里对精神传统和科学工作的连续性所采取的态度。这里适用的也是：Je ne sais pas l'art d'être clair pour qui ne veut pas